

试论《反杜林论》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施德福

余其铨

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在马克思的坚决支持、密切合作下写成的。在这一伟大的著作中，恩格斯不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杜林的反动思想体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且“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

《反杜林论》出版后的一百年来，它始终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不可估量的、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反杜林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作初步的探索，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反杜林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也进一步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是对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本身是一个有机联系、无

限发展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也就必然是既不断丰富发展，又有其内在联系的体系。也就是说，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不是以往的哲学家们所企图建立的那种封闭的、僵死的、“最后完成的体系”；同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原理之间又都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而不是单个词句、个别原理的堆砌和机械组合。正因为如此，恩格斯一方面痛斥了杜林之流自称已经建立了囊括一切的“最后的”、“终极真理体系”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反杜林论》1970年版第34页，以下凡引自此书的，只标页码）如果“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末，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这一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进展就中断了”，（第34页）从而也就“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恩格斯说：“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在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第4页）很显然，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一方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凝固化，把它变成象“圣经”一样的宗教教条，根本否认它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污蔑为“就那么几条”，是象积木一样可以任意摆弄的“几块板子”，肆意加以肢解割裂，根本否认它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歪曲和篡改。

恩格斯之所以在《反杜林论》一书中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正式问世，到《反杜林论》的发表，已有三十年。在此期间，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自然科学取得了重要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有必要也有可能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连贯起来，加以系统的论述。其次，这也和恩格斯批判的“对象本身的性质”有关。杜林是一个极端狂妄的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为了推销他的假社会主义，他抛出了一个由多卷巨册组成的、内容极为庞杂的“理论”体系，而且“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恩格斯1876年5月28日致马克思的信）为了彻底粉碎杜林的反动思想体系，恩格斯就必须跟踪追击，并在论战中正面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因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们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第6页）第三，当时在德国，“创造体系”成了一种风气。杜林是个突出的典型，但不是个别现象。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也是“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第4页）他们虽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既不懂得又不认真研究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化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马克思1877年10月19日致左尔格的信，《马克思全集》34卷第，281页）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也说过：“……德国的重大错误还在于，让大学生和其他不学无术的“学者”以党的科学代表的身份向全世界大肆散布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是一种必然要经受的幼稚病，恰恰是为了缩短病程我才以杜林为标本作了那样详细的分析。”（恩格斯1878年1月11日致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4卷，第293页）

恩格斯在对杜林体系的批判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的论述中，贯穿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第3页）杜林无耻地宣称，他的哲学体系已经确立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实际上在他的哲学中处处暴露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十足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而他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都是从他在哲学中确立的“原则”出发，通过逻辑推演引申出来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反映，而是所谓“普遍公平原则”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先批判了杜林哲学体系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理论上粉碎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分析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陷入空想的根源时也指出，除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外，还由于他们的世界观特别是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第17页）

从世界观上说，也就是要用唯物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用唯物史观代替唯心史观。同空想社会主义相反，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的客观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从经济根源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对抗的根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从而把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恩格斯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都说明：科学社会主义者必须同时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能夺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丰富、发展的。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基本观点得到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证和发挥。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首先就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八十年代出版的《费尔巴哈论》。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论述，是在同杜林的激烈论战中进行的，是贯穿全书的。这里我们仅以《引论》和《哲学编》为重点，作一个简略的概述。

在《引论》中的《概论》一章，恩格斯历史地考查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哲学方面，着重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意义；论述了辩证法思想历史发展的三种基本形态（朴素辩证法、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指明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的实质。

在第三、四章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论述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批判了杜林从思维的统一性引出存在的统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述了世界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唯物主义原理。

在第五——八章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在物质与时空、物质与运动的关系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和运动观；批判了杜林对达尔文进化论、细胞学说的歪曲和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并通过对生命起源、生物进化和有机体细胞的科学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客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辩证发展的原理。

在第九——十一章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道德观、平等观以及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此外，恩格斯还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论述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根源，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引论》中批判了杜林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英雄史观。

在第十二——十三章中，恩格斯集中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及其对辩证法的歪曲和攻击，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及其内容，指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

以上的简略概述表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几乎已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基本原理。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不仅把马克思和他本人以往所阐明的哲学观点作了集中的、系统的论述。而且在论战中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结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关于世界的物质性。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物质还是精神？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基本前提之争。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在批判杜林世界统一于“存在”的折中主义谬论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著名论点，并指出这一论点的根据就是人类的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他说：“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第41页）恩格斯还论证了物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以及时空的无限性。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 and 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第46—47页）在物质和运动、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上，恩格斯也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第56页）物质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可以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但是“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

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灭的”（第57页）。又指出：“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确定的运动形式说来才是有意义的。”（第57页）例如，某一种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但这绝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也不妨碍这一物体内部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恩格斯的这些论断，不仅彻底地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而且有力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首先，恩格斯通过对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批判，进一步论述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第32页）在这里，恩格斯精辟地概括了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科学地回答了精神和物质、思想原则和客观实际谁决定谁、谁适应谁、谁检验谁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在真理问题上，杜林是个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者。恩格斯针对杜林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绝对可靠性等等谬论，系统地论述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

的和有限的。”（第84页）“拥有无条件的真理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第83—84页）恩格斯还论述了真理和谬误的关系，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范畴一样，只有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在一定条件下，“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第88页）

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并不是要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恰恰是要正确地、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把主观能动作用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在同杜林斗争中所阐明的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科学地揭示了客观规律和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他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第111页）恩格斯唯物主义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一辩证因素，并把它同实践联系起来。他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第111页）“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于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第112页）恩格斯简要地概述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指出从原始人类的摩擦生火，到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人类逐步取得更大程度自由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列宁对于恩格斯的这些光辉思想给以很高的评价，指出恩格斯论述自由和必然的“每一步骤、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完全是

而且纯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的”，是“十九世纪哲学的真正的进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84—185页）。

（三）关于唯物辩证法。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集辩证法思想之大成者，并第一个阐述了辩证法的三个规律的内容。但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把辩证法“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自然辩证法》第46页）黑格尔把否定的否定看成是最高规律，是“辩证法的精华”，也是他的“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自然辩证法》第46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给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并在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典范，也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来系统表述唯物辩证法的巨著。列宁在谈到《资本论》的哲学意义时曾指出，马克思虽然没有遗留下一本大写字母的“逻辑”，即就是说，没有写出专门讲述唯物辩证法的著作，“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哲学笔记》第357页）

《反杜林论》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在于它从哲学方面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特别是第一次阐述了它的三个基本规律——矛盾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的否定规律的思想。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同时，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这三个基本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且给唯物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

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第139页）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所固有的，观念的辩证法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脑中的反映，从而消除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神秘性；辩证法学说实质在于阐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划清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界限；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规律的科学。它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表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但都特别重视矛盾规律，认为它在辩证法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辩证法”。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二下分讲了矛盾问题，恩格斯认为“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就是“进到辩证法”。在《概论》中，恩格斯还着重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思维方式对立的实质，在于是否“对立的两极”（如正和负，原因和结果等）既是彼此对立的，又是“彼此不可分离”、“互相渗透”的，而且是“经常交换位置”的。在二版序言讲到两种自然观的对立时又指出：“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12页）很显然，恩格斯的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矛盾（对立统一）观点在辩证思维中的重要意义。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的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三个规律的科学概念。但以后不久，在1879年写的《辩证法》一文中，就作了明确的

表述。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归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互相渗透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自然辩证法》第46页）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一系列著作中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全面、最系统论述的著作之一。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这两本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62页）

在《概论》中，恩格斯论述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基本内容及其意义。着重指出，“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是1831年法国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1838——1842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这表明，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建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第23页）。唯物史观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适应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恩格斯概括地论述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指出：“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第24页）与此相反，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是：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

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第24页）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指出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通过对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的批判，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制度和政治暴力的关系。杜林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暴力的关系。他认为“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总是第二等的事实”，剥削制度起源于暴力，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所有制。”恩格斯指出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并针对杜林的观点发挥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157页）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剥削制度的产生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决不是使用暴力的结果。相反地，政治暴力倒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产物，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和剥削者的利益而产生出来的。通过暴力可以掠夺别人的财物，但是在掠夺者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已经存在了。“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第160页）

恩格斯还指出，暴力本身并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有其

必要的物质前提，即武器和士兵，而这是由生产水平决定的。恩格斯用大易的历史事实论证了政治暴力对经济条件的依赖性，指出：“军队的全下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易和取决于技术”。（第168页）

恩格斯认为政治暴力并不是经济关系的消极产物。它一旦产生，就对经济发生巨大的反作用。指出：“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第180页）这就是说，政治暴力的反作用表现为或者是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革命的暴力；或者是阻碍经济的发展，这是反革命的暴力。只有适合经济发展要求、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政治暴力，才能在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而同经济发展要求相违背的反动政治暴力，不管看起来似乎多么强大，终将被历史当作“政治废物”被清除。

杜林的唯心史观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完全否定人的历史发展，抹煞人的阶级性。从抽象的“两个人”出发，按照数学的方法，从定义、公理中推论出“永恒真理”。他认为，“两个人”是组成社会的细胞，而“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并且认为这就是“道德正义”、“法律正义”的“基本形式”。杜林的超历史、超阶级的道德原则、平等原则就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杜林的谬论，并深刻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和平等问题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指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观念和平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第91—92页）“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第92页）恩格斯还指出，抽象的、永恒不变的平等原则同样是不存在的。平等观念是随着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第104—105页）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在表现形式上是普遍的、“全民的”，实际上是有其阶级内容的。它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等价交换原则的反映。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废除封建特权，以便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要求存在人权上“自由、平等”的劳动者，以便把它们变成资本的雇佣奴隶。它完全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相对立的无产阶级平等要求，它的实际内容就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第104页）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相一致的。否认消灭阶级而侈谈平等，只能是骗人的鬼话；超出消灭阶级和阶级差

别的范围要求绝对平等，则必然陷入空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是以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为基础的。恩格斯指出：

“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第8页）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十分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亲自对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第8页）他遗留下一千多页的数学手稿。恩格斯从1873年开始用大部分时间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打算从哲学上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写一本《自然辩证法》的巨著。后来，由于反击杜林而中断了这一工作，但在《反杜林论》中却体现了他研究的部分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杜林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著作。杜林的哲学体系是打着“科学”的招牌出现的，为了粉碎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恩格斯研究了自然观的历史发展，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及其意义，大量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批判了杜林自然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一步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反杜林论》中所涉及的理论自然科学问题表明：恩格斯不仅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研究了理论自然科学（其中有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力学等等）；而且在许多方面得出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预见。这里，我们仅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概述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贡献。

首先，恩格斯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辩证唯物

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是自然观上的革命变革。十七至十八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观文事物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占统治地位。这是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相联系的。自十五世纪末叶以来，自然科学为了研究自然界的各个细节，就把它们从总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对其特性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研究一方面使人类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却也使人们养成一种用孤立、静止、片面地观文事物的习惯。后来，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又把这种方法当作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自然科学领域移植到哲学领域，因而造成了西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反过来，又影响自然观。十九世纪初，黑格尔第一个自觉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但是，他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费尔巴哈论》第33页）而自然界则是僵死不变的，“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第10页）黑格尔的自然观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抛掉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变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第8页）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不仅有其思想资料来源，而且还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如“真正”气体的液化、气体分子运动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等等，清楚地说明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第2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地吸取人类认识史上的优秀成果，概括总结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基础